

《世界经典名著》

果戈里小说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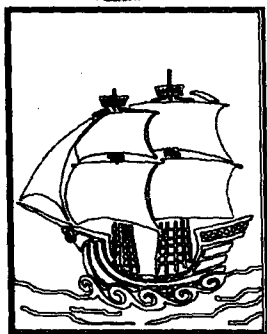
〔俄〕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里



Guogeli
Xiaoshuocuan

果戈里小说选

[俄] 果戈里 著
苏 畅 李英华 译



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里（1809—1850），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和奠基人，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地主家庭，从小就喜欢民谣，传说和戏剧。

1831年，果戈里结识普希金，在创作思想上受到重大影响。就在这年9月和次年3月发表的《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集和第二集这两部小说，展现了富有诗意的乌克兰民族生活，被普希金誉为俄国文学中“极不平常的现象”。1835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集《禾尔戈罗德》和《小品集》表明果戈里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开始形成。

在果戈里一生的创作中，除长篇小说《死魂灵》、剧本《钦差大臣》等代表性作品外，他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也达到了一个极高的艺术境地。在他的这些作品中，贯穿着一种独特的讽刺幽默风格，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丑恶现象都给予了尖刻的讽刺和嘲笑，但嘲笑之中透出一种温和的幽默和痛惜的泪水，被称为“含泪的笑”。

目
录

外 套	(5)
旧式地主	(40)
斯罗察集市	(65)
圣诞节前夜	(100)
鼻 子	(152)
五月的夜晚	(184)
涅瓦大街	(220)
画 像	(263)
伊凡·费多罗维奇·什邦卡和他的姨妈	(327)
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夫罗维奇之争	(357)

外 套

在局里……不过，还是不要说出是哪一个局为好。没有比各种名目的官厅、团、局、办事处——总之大大小小的各种官员，更加爱发脾气的了。如今，每一个人都认为，冒犯他就是冒犯了整个社会。据说，不久之前，有一位县警察局长，是哪一个县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上递一张呈文。他在其中清楚地陈述：国家的法纪正趋衰微，它的神圣的名字正遭到轻视和亵渎。他在呈文之后附上一大卷奇闻轶事作为证据，那里每隔十页就出现一次某个县警察局长的名字，不少地方甚至说他总是喝得酩酊大醉。因此，为了避免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不妨把这里就要说到的局称为某某局好了。总之，是在某某局里有这么一个官员，此人相貌说不上出众，个子矮矮的，脸上有些麻点，头发浅红棕色，看样子眼睛不大好使，脑门上有些秃顶，两边脸颊上布满皱纹，脸色就像是患有痔疾一样带点灰黄色……有什么办法呢？这只能将缘由归结到彼得堡的气候上去。至于说到官衔（因为我们这里一张口就得报上官衔），那么他是所谓的终身九等文官。大

家都知道各式各样的作家们都有一种值得称道的习惯，就是擅长挤迫那些不会厮咬反抗的人。他们对于九等文官之类的小官吏当然也是极尽调侃和揶揄之能事，尽情奚落他们。这个官员姓巴什马奇金。从这个字的发音中可以看出，这姓氏跟“鞋子”有些渊源；然而，它是何年何月，什么时候，怎么从“鞋子”这个词儿演变过来的，那就无从查考了。他的祖父、父亲、甚至内弟乃至巴什马奇金一家人都只穿长统靴子，每年只换两、三次鞋掌。他的名字叫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读者或许会觉得这名字有些古怪，是挖空思想出来的，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这决不是费尽心思想出来的，而是客观情况下自然地形成，无论如何不能用别的名字来代替，只能是这么个叫法。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在5月23日的凌晨出世的。他那已故的母亲，一位官员的妻子、一位贤惠的妇人，作好准备打算给婴儿像样地受洗取名。她那时还躺在正对着门的床上，右首站着教父——一个出名的好人，在参议院当科长的伊凡·伊凡诺维奇·叶罗什金；而教母则是一位警察局长的妻子，一位品德十分高尚的妇人，她名叫阿丽娜·谢苗诺夫娜·别洛勃留什柯娃。他们送上三个名字，任产妇从中挑选一个：莫基亚、索西亚或者就用受难圣徒的名字——霍兹达扎特。“不行，”已故的母亲当时暗暗想道，“这些名字都太平常了。”为了能使她称心如意，大家把日历翻到另一页上。又出现了三个名字：特里菲利、杜拉和瓦拉哈西。“这真是受罪啊，”母亲说，“尽是些什么样的名字啊！我一辈子都还没听说过这样的名字呢。就是叫瓦拉哈特或者瓦鲁赫，倒也还说得过去，可是偏偏又是什么特里菲利和瓦拉哈西。”又翻了一页——上面写着：帕夫西卡希和瓦赫季西。“算了吧，我想就

这样，”母亲说道，“看来他就是这么个命。既然是这样，就叫他父亲的名字好了。父亲叫阿卡基，儿子也叫阿卡基吧。”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是这么个来历。孩子受了洗，这时他哭了起来，还做出一脸怪相，仿佛他早就知道以后会当上九等文官似的。总之，这就是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提到这件事，因为是要让读者们认识到这一点：取这个名字完全是事出有因，取别的名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他什么时候，何年何月到局里当差的，是什么人帮忙安排进来的，那就谁也记不清楚了。无论换了多少任局长和各级上司，他总是坐在老地方，还是老样子，干着老差事，始终只是一个抄抄写写的官儿。以至于人们后来都相信，他显然本来就是现在这样一副模样，穿着文官制服，头上谢顶，来到这个世上的，他在局里一点也不受尊重。当他走过的时候，门卫不仅不站起来，而且正眼也不看他一眼，好像当他是一只飞过接待室的普通的苍蝇一样。上司们对待他既冷淡又专横。一个副科长居然把公文直接扔到他的鼻子底下，甚至连“请抄写一下”、“这一件案子倒挺有意思的”或者高雅官厅中其它常用的客套话都懒得说一句。而他呢，什么也不说，只望一眼公文，就马上接过来，也不管是谁塞过来的，那人有没有权利指使他。他一接过公文，立刻就开始动手抄写。年轻的官员们把官场中流行的卖弄聪明的本事都使了出来，嘲笑他和逗弄他，当着他的面大讲有关他的种种瞎编的故事：说他跟房东老太太——一个已过七十的老太太有一手，说那女人经常打他，还问他们俩什么时候办喜事，又把碎纸片撒在他的头上，说是下雪了。但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却总是一言不发，仿佛他眼前什么人也不存在似的；这样的逗笑甚至也没有影响到他的工作：即使是在一阵阵打扰之中，他

也不会抄错一个字。只有当玩笑实在开得太过火了，比如说碰到了他的胳膊，妨碍他抄写文书的时候，他才嘟囔一句：“别打扰我，你们干嘛总跟我过不去？”他这话语和声音里透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调子。其中包含着一种让人怜悯的愁苦，所以，当有一个刚来不久的年轻的官员本来也想学样，恣意挖苦他时，忽然打住了话头，好像被猛地刺了一下似的。从此他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变了样子，与以前截然不同。一种不寻常的力量使他跟刚熟识的同事们疏远开来——而他本来是把他们当成是体面的上流人物的。后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当遇到开心事的时候，他的脑海里总会出现那个个子矮小、脑门秃顶的小官吏和他那句让人揪心的话语：“别打扰我，你们干嘛总跟我过不去？”——从这句让人撕心裂肺的话里可以听出这样一层意思，那就是：我是你的兄弟啊。可怜的年轻人忍不住掩面叹息，后来在他的一生中曾有许多次他不寒而栗，因为他发现人的身上竟然隐藏着如此之多的残忍的因素，在文质彬彬、极富教养的上流人物的外表下，甚至在人们公认为高尚和正派的人的身上居然夹带着那么多的残暴和粗野的东西……

在别的地方未必还能找到像他这样恪尽职守的人了。只说他兢兢业业、勤奋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不，他对这份差使简直是万分痴迷。他在抄抄写写当中仿佛看到了一个异彩纷呈，令人愉悦的世界。一种洋洋自得之情在他的脸上充溢着。有几个字母特别地令他心醉，他一写到这几个字就难以自持，不觉小声地笑起来，眨巴着眼睛，嘴唇一弯。只要看他脸上的表情几乎就能看出他正在抄写的是些什么字母。倘若按勤勉尽职来论功行赏的话，恐怕连他本人都会大感意外——他准够得上当个五等文官了。可



是，正如他的那些爱挖苦人的同事们说的那样，他干这份差事那么多年，却只挣得一枚小领章和身下的痔疮。不过话又说回来，也不能说他们都对他完全漠不关心。有一位局长是个好心人，看他服务多年也想对他进行褒奖，吩咐给他干一些比抄抄写写更重要的事情：也就是为一件已办好的公事拟一封公函，送到另一个办事机关去。事情十分简单，只要改写一下行文的标题再把动词的第一人称形式改为第三人称就行了。没料到他干起来却十分费力，急得浑身冒汗，不停地擦着脑门上的汗珠，最后终于说道：“不行，还是让我干抄抄写写的工作好。”从此以后，他永远只能干这份抄写的差使了。对他来说，好像除了抄写公文之外，其余的差使他一概不在行。他一点也不讲究打扮：一套制服不是原来的绿色，而成了棕红带白的颜色。衣服领子又窄又矮，以至于那不长的脖子，居然也能从领口伸出来，显得格外颀长而难看，就像是在俄国几十个聚成一堆的外国商贩，头上顶着摇头晃脑的石膏制成的小猫，一个个伸长了脖颈一样。而且他的制服上总是有点儿什么东西粘在上面：或者是一小截干草，要不就是一小截线头。况且，他还有一种特殊的本领，那就是每回他走在街上，别人从窗口扔下污七八糟的东西时，他就准能恰好赶上，于是他的帽子上总点缀有西瓜或香瓜之类的东西留下的污点。他一辈子从不曾留心街上每天发生的事情和其中的变化，大家知道，他的同事——一个年轻的官员，总是目光锐利，从不放过街上的丁点儿动静，甚至连对面人行道上有人裤子的套带脱落了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于是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笑意。

然而，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即使眼睛盯着什么东西时，他所看见的也只是一行行写得干净、整洁的字体，除非不知从什么

地方冒出一个马头来，伸到他的肩膀上，鼻孔里呼出一阵热气直扑他的脸颊时，他才会回过神来：原来自己已不在字里行间埋头抄写，而是走在街道中间。回到家里，他立刻坐到桌旁，急匆匆地喝着菜汤，啃着一块夹葱的牛肉，也不辨别一下食物的滋味，就连同苍蝇和老天爷此刻送到嘴边的任何东西一块儿吃下去。他要是觉得肚子填饱了，就从饭桌旁站起来，拿出墨水瓶，开始抄写带回家来的公文。要是抄写时没有公文，他就自得其乐地有意给自己抄下一份副本，特别是当那份公文的妙处不在于文笔的流畅优美，而在于它要被呈送给一位新官或者权贵的时候。

当夜幕降临在彼得堡灰暗的天空，所有的官员根据各自的薪俸和个人的癖好而吃饱喝足之后——当局里鹅毛笔写字时发出的声音停息下来、干完了自己和别人的必要的事务，而那些爱闹者也自愿地干完了一些事情之后而一切都停顿下来的时候，当官员们都忙着自找乐趣以打发剩余时光的时候：有的人动作麻利，直奔剧院；有的人去逛大街，去仔细观赏那不同种类不同花色的女帽；有的人则去参加晚会——恭维一位被一小群官员捧为明星的漂亮的小姐，对她说着软绵绵的情话以消磨时光；有的人（这是司空见惯的）则干脆跑到三楼或者四楼的同事家里去，那里通常有两间小房，外带一间前室或者厨房，房间里摆着一些时髦的玩意儿，一盏灯或者经过省吃俭用、放弃游乐才换来的一件工艺品——总之一句话，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刻，当所有的官员跑到各自的朋友家的小屋里玩起了惠斯特牌，啃着廉价的面包干同时捧着杯子啜几口茶，含着长烟袋吞云吐雾，一边发牌一边讲着一些从所有俄国人极其向往的上流社会里传出的种种流言蜚语，当实在无话可说的时候甚至把那些永说不厌的趣闻又翻出来说一遍，说



的内容是有关一位城防司令的。说他接到禀报，法尔康雕塑纪念像的马尾巴被人砍掉了——总之，即使当大家都竭力去尽情享乐的时候，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也从不找个地方去消遣。谁也说不上什么时候在晚上遇到过他。他尽情地抄啊写啊，直到抄写完毕才心满意足地躺下休息，同时一想到明天就暗自露出笑容：老天爷明天又会把什么东西赐给他让他抄写呢？一个年俸 400 卢布、而能随遇而安的人，就这样打发着平静地日子，或许可以一直过着这种日子直到垂暮之年。可是人在生活道路总是多灾多难，不仅九等文官，就是三等、四等、七等文官和各式各样的顾问官，乃至徒有其名、从不干正事的官员都无一能例外。

在彼得堡，所有年俸 400 卢布左右的人都有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这个敌人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北方的寒冷天气。尽管也有人说，寒冷对于健康是大有好处的。早晨八点多钟，正是满街走动去局里上班的人的时候，它就开始大发淫威，不分青红皂白，直刺着每个人的鼻子，弄得可怜的官员们简直不知道把鼻子藏到哪里去才好。在这个时刻，哪怕是再显达的高官贵族也冻得脑门发痛，涕泪直流，可怜的九等文官有时毫无办法就只能束手待毙。唯一能摆脱这种困境的办法，只能是穿着薄薄的外套尽快地跑过五、六条街道，然后在门房里使劲地跺脚，直到所有在路上被冻僵了的处理公务的能力和才干全融化开了恢复过来为止。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近来已经开始感到脊和肩膀冷得难以忍受，尽管他竭力尽可能快地跑过那一段该跑的路程。他终于琢磨出原因来了，难道说毛病出在他的外套上？回家之后，他仔细查看了一下外套，发现果然有两三处地方只剩下一层稀麻布了，而且正好都是在背部和肩膀上，果然那儿的呢子磨得透了风，连



衬里也已破烂不堪。顺便提一句，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外套也早已成了官员们的笑柄，甚至它连“外套”这个高雅的名称也不复存在，都管它叫罩衫。不过，它的样式也的确变得十分古怪了：衣领变得一年比一年小，因为拿它的一部分去补别的部位了。这补丁又不像是出于裁缝的手艺，缝的实在是又笨拙又难看。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看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决定把外套送到裁缝彼得罗维奇那里去，他就住在沿后边楼梯上去的四层楼上，他虽然是个独眼龙，长着一脸麻子，可是修补官员们和其他各式人等的裤子和燕尾服的手艺倒也是相当不错的——当然了，那非得在他没有喝醉、脑子里也没有想别的念头时不可。说到这个裁缝，当然不该在他身上多费唇舌以免喧宾夺主，可如今是这么个规矩，讲故事非得把每个人物的性格说个一清二楚不可，所以没有办法，我们也只好在这里把彼得罗维奇的情况向各位作个交待。他的名字本来就简单地叫格里戈利，是一个地主老爷家的农奴；自从领了自由证书，每到节日总要痛饮一番，刚开始是每逢大的节日的时候喝，到后来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日历上印着一个十字的宗教日子他都喝得酩酊大醉——从这个时候起，他就改名为彼得罗维奇了。从这方面来说，他是信守祖辈传下来的习俗的，就是跟老婆吵嘴时，总骂她是“不信教的土包子”和“德国娘们儿”。既然我们提到他的老婆，那么关于她也得说上几句；不过，遗憾的是对她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彼得罗维奇有一个老婆，总是戴着包发帽，而不围头巾；但要说到她的姿色，那就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了；至少可以断言，只有一些近卫军士兵碰到她时，才会从包发帽底下去偷偷瞧上她一眼，然后翘翘胡子，发出一阵古怪的嘘声。

通往彼得罗维奇家的楼梯，老实说吧，全是湿乎乎的，污水横流，还有一股刺得人眼睛难受的怪味儿，大家知道，彼得堡的幢幢楼房的后边楼梯几乎都免不了有这种味儿——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边上楼一边盘算彼得罗维奇要多高的价钱，他暗暗拿定主意最多只给两个卢布。房门是开着的，因为女主人正在烹鱼，弄得厨房到处是烟雾，连那些乱爬的蟑螂都看不清了。女主人当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穿过厨房时，甚至也没有发现他。她径直走进房去，只见彼得罗维奇端坐在一张没有上过漆的大木桌上，盘着腿的那副模样，俨然是一位土耳其总督。两只脚按照坐着干活的裁缝的习惯，打着赤脚。首先引人注目的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十分熟悉的那只大拇指，上面长着像龟壳一般又厚又硬的形状奇怪的指甲。彼得罗维奇的脖子上吊着一串丝线和棉线，膝盖上铺着一件破衣裳。他捏着针头穿针眼，已经花了有两、三分钟了，还是没穿上，所以，对这么昏暗的光线十分生气，甚至对那怎么也穿不过去的线条也生气了，低声地埋怨说：“还穿不上，恶婆娘；你把我害苦了，你这个坏家伙！”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觉得自己来得不是时候，正碰上彼得罗维奇处在气头上：他喜欢挑彼得罗维奇喝得有点醉醺醺的时候，或者像他老婆说的“这独眼鬼灌了一肚子猫尿”的时候上门来定做活儿。每逢这种时候，彼得罗维奇一般都很好说话，肯让点价，并且痛痛快快地答应，甚至每次都是又鞠躬又道谢的。事后，尽管他的老婆总会哭哭啼啼地找上门来，说她的丈夫喝醉了，所以要价太低了，不过，往往只要再添上10个戈比，事情也就了结了。可眼前的彼得罗维奇看上去没有喝醉，所以十分固执，不大好说话，鬼知道他会怎么样漫天要价啊。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心里明白

了这一点后，就像俗话说的那样，正想打退堂鼓，可是已经来不及及抽身后退了。彼得罗维奇眯着一只独眼紧盯着他，于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只好开口说道：

“你好，彼得罗维奇！”

“向您问好，先生，”彼得罗维奇说道，用他的独眼斜瞟了一下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那双手，想要看看送来的是什么活儿。

“我到你这儿来是——彼得罗维奇，那个……”

要知道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说起话来，总是喜欢夹带不少前置词、副词，甚至许多毫无意义的语气词。倘若碰到的是一件棘手的事儿，他往往会一句话也说不完整，因此经常一开口就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事儿么，说实在的，很那个……”马上就没有下文了，甚至连他也忘了究竟要说什么了，还以为事情都说清楚了呢。

“什么事呀？”彼得罗维奇说，同时，用那只独眼上上下下打量他身上的制服，从领口到袖子、背脊、后襟和扣眼，一处也不放过——这些地方他全都十分熟悉，因为这是他亲手缝补的。裁缝都有这样的习惯，一见面头一件事就是仔细先看看你穿的衣服。

“我是为那个……彼得罗维奇……是这件外套，呢子的……你看别的地方都还挺结实的，就是稍微有些脏，看上去好像是旧了点儿，其实还是新的，只是有个地方有点那个……在背上，还有，你看这个肩膀上磨破了点儿，就是这个肩膀有点儿……你看，就这点儿活。不会怎么费事的……”

彼得罗维奇接过罩衫，先把它摊放在桌上，仔仔细细地看了许久，摇了摇头，伸手到窗台上去取一只上面印着一位将军的画



像的圆形鼻烟壶，印的到底是哪门子的将军就无从知道了，因为将军的头脸都被手指抠破了，后来就干脆贴上了一块方形的小纸片儿。彼得罗维奇闻了闻鼻烟，双手把罩衫撑开，对着亮光细看了一番，又摇了摇头。然后，他把衬里翻了过来，又摇摇头。再次打开贴有将军像和小纸片儿的鼻烟壶盖，捏了一撮鼻烟塞进鼻孔里，关上盖子，把鼻烟壶藏好，这才说道：

“不行了，没法子补了，这衣服穿的太烂了！”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听这话，心里不禁咯噔一下。“怎么就没法补了呢，彼得罗维奇？”他几乎像孩子一样央求说，“只不过肩膀上磨破了点儿，你这儿总有些小块碎布料吧……”

“小块碎布料倒是可以找一找，倒也不难找，”彼得罗维奇说，“可是补不上去啦：这些地方全都朽了，只要用针一碰底子就酥了。”

“酥了也没关系啊，你马上打个补丁不就行了吗？”

“补丁往哪儿打呀，没地方下针脚啊，实在太破了，挂都挂不住了。说起来这也是叫呢子，可风一吹就成碎片了。”

“你就给补一补吧。怎么会呢，实在是，那个……”

“不行，”彼得罗维奇拒绝说，“根本没办法了。这衣服根本就没法穿了。您不如等天气再冷一些时把它改做包脚布吧，穿袜子可不够暖和。袜子是德国佬为了多捞钱而想出来的破玩意儿（彼得罗维奇喜欢一有机会就挖苦一下德国人）；看来，您非得做一件新外套不可啦。”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听见做“新外套”几个字，顿觉两眼发黑，屋里所有的东西都在他眼前打转，成了一片混沌。他能看清楚的东西只有彼得罗维奇的鼻烟壶盖上那脸上贴着的小纸片儿

的将军。

“怎么，要做新的？”他仍然像是在做梦似的，说道，“我可没有钱做新的呀。”

“对啊，得做一件新的了，”彼得罗维奇平静地说，语气里一点也没有表示出同情。

“那么，要是非做一件新的不可，那它那个……”

“您是说花要多少钱？”

“是的。”

“那得花 150 多卢布，”彼得罗维奇说道，同时意味深长地抿紧了嘴唇。他非常喜欢装腔作势，喜欢突然耍那么一招令人尴尬、然后斜睨着对方看他受窘时脸上的那副怪样子。

“做一件外套要 150 多卢布！”可怜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不禁喊出声来，这恐怕是他这一辈子头一遭这么大喊，因为他说起话来向来都是细声细气的。

“没错，”彼得罗维奇说，“那还得看是做什么样的外套呢。要是安上一个貂皮领子，再给风帽衬个绸里子的话，那就非 200 卢布不可。”

“彼得罗维奇，求求你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恳求说，对彼得罗维奇说的话听而不闻，对他装腔作势的表情视而不见，“你就想法子给补一补吧，只要还能对付着穿就行了。”

“那可不行，浪费了工夫不说，还白花那么多冤枉钱，”彼得罗维奇说，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听了他这么一说，只好神情沮丧地走了出来。而彼得罗维奇在他走了之后，又站了很长时间，他意味深长地抿着嘴，没有马上动手干活，因为他心里很是得意：既保持了自己的体面，又没有糟蹋裁缝的手艺。

